

陈独秀与蔡元培教育思想之比较

○ 陈祥明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陈独秀、蔡元培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他们的教育思想差异很大,对现当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也迥然不同。本文从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理念的提出,现代新式教育的科学构想与实践,以“科学”“民主”为统领的现代教育观,以培养新国民为旨归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思想,着眼于塑造青少年健全人格的现代美育思想等多个维度与层次,对蔡元培、陈独秀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比较,并对他们教育思想的不同的历史贡献与影响进行了阐述分析。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它们应该也可以相融互补。对其进行深入诠释和深度综合,并加以吸收和借鉴,有益于我国国民教育的当前改革和未来发展。

[关键词]陈独秀;蔡元培;教育思想;比较

陈独秀、蔡元培都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他们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其影响至今有增无减,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参照坐标。然而,陈独秀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差异很大,对现当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也迥然不同。因此,对陈独秀与蔡元培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他们教育思想的不同特点、不同价值和意义。

一、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理念的提出

陈独秀、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主权日益沦丧,贫弱落后的中国被外国列强肆意瓜分蹂躏,

作者简介:陈祥明(1956—),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安徽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而革命几起几落终归失败。新文化运动前后,振兴中华成为先进分子的自觉行为。但是如何振兴中华,有识之士们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学贯中西,对西方新式教育有深入了解的陈独秀、蔡元培,比较早地提出了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理念与主张。他们认为,中国与西方从表面上看是物质技术的、社会制度的差距,而实质上是国民教育的差距,西方的强盛在于教育的先进,而中国的弱贫在于教育的落后,因为教育进步是科学进步、民主进步的基础。

陈独秀把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同国民所受教育程度联系起来。他说:“社会之文野,国势之兴衰,以国民识字者多寡别之,此世界之通论也。”^[1]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人口数量并不等于人口质量,他指出:“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而自豪,实是梦话。……我们要晓得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活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2]陈独秀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认为:“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3]在他看来,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贤能的阶梯,“人类的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慧贤否迥然不同,这就是吾人必须教育的铁证了。”^[4]

与陈独秀相比,蔡元培不是一般性地强调教育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作用,而是主张引进西方新式教育来改造中国传统教育,以新式教育来改善国民的科学、身体、艺术和道德素质,提升国民综合素质,进而提高整个国力。他认为欧战(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法等国强盛是以新式教育为基础的,他们推行“科学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即智育、体育、德育、美育,培养实用的、强健的、人格完善、情感丰富的国民大众。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教育所缺乏的,也是我们国民教育最需要的。^[5]在蔡元培看来,强国必须强民,强民必靠教育,引进西方新式教育是强民强国的必然选择。

二、现代新式教育的科学构想与实践

陈独秀、蔡元培都对现代新式教育进行科学构想与竭力实践,都对传统旧式教育进行批判和革新,以西方近代新学来改造和取代中国传统旧学。但他们对新式教育的构想与实践的方向重点存在一定差异。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的奠基者。^[6]蔡元培于民国元年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内,就对中国现代新式教育作了初步的然而却是系统的构想,这一构想充分反映在他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7]他对新教育与旧教育的分歧作了深入揭示,并对新教育所具有的特征、应具备的品格、可进行的尝试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8]

蔡元培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尤其是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 - 1923),借鉴近代西方尤其德国、法国教育经验,对我国传统教育进行彻底改造,

对现代新式教育作了科学构想并逐步付诸实践。

蔡元培对现代新式教育的科学构想与实践,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废除贵族教育,实行国民教育,贫富机会均等,贵贱不分,男女平等。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伊始,便批评老北大的贵族气、陈腐气、封建遗毒;整顿校风校纪,严禁学生嫖娼、赌博、吸毒、娶妾;实行不分贫富、没有贵贱的平民化教育;打破性别歧视,开始招收女生入学。他竭力倡导、大力支持国外勤工俭学和国内工学、平民教育和贫儿教育,他重视职业教育,赞扬劳工神圣,亲自为华工写讲义。^[9]

第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殿堂,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要传播人类文明之成果,要培养社会有用之人才。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给大学性质作了界定:“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10]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式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1]他在北京大学 22 周年开学式训词中,这样要求:“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学问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12]这就要求大学教师有真学问,有好德行,指导学生研究学问,砥砺德行,惟如此,才能传播人类文明成果,培养社会有用人才。

第三,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文科理科相互沟通,着眼于青年学子的全面发展和完美人格塑造。蔡元培认为,教育不能满足于追求分门别类的知识,还要追求真善美统一的最高境界,因此,科学教育求真,道德教育崇善,艺术教育尚美,诸方面有机融合统一,不可偏废,厚此薄彼。^[13]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要处理好通识教育和分科教育的关系,通识教育不排斥分科教育,而分科教育要具有通识视野。他明确反对中学进行分科教育(分成文科与理科)。他主张大学可以进行分科教育,以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但他反对“重实用而轻学理”,认为这是“目光短浅”。他认为德国大学教育学理与实用兼顾,科学昌盛并哲学发达,因此,北京大学“二十年中校制之沿革,乃颇与德国大学相类”。^[14]

第四,大学要实行学术民主,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同学术派别、持不同学术观点者要相互尊重、彼此共存,而非你死我活。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5]大学应该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而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真正发展

的。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16]总之，蔡元培在学术上主张：“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17]

第五，教育具有超越性特质，不以党派宗派意志为旨归。蔡元培的理想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18]在他看来，大学是知识之殿堂，而非权力之衙门，大学应具有独立精神，不应被政府官僚所任意干涉和操纵。他在辞北大校长之职时宣言：“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19]他对当时政府及其官僚的封建专制，采取了“不合作主义”，^[20]进行了不妥协的抗争。他把学术民主、思想自由贯穿于教学、学术活动和学校管理，依靠教授会决定教学、学术、学校管理方面大事，而校长执掌校务会从事日常管理工作，开了“教授治校”先河。^[21]在他看来，治校为了治学，治学为了育人，治学育人是根本，因此治校服从于治学。教授无疑是治学的主体，当然也是治校的主体，校长要依靠教授治学治校。

蔡元培于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就职。^[22]蔡元培到北大后不到十天，即1月13日，就聘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到校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23]此后，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阵营，成为蔡元培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力量。“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24]

与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相比，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对新式教育的构想其系统性显然要弱一些，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实践和发展了蔡元培的新式教育构想。然而，陈独秀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张曙明先生将其概括为：“自觉的继承性”、“鲜明的时代性”、“高瞻远瞩的战略”、“突出的务实性”。^[25]陈独秀对现代中国教育的开拓性贡献在于：首先，他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时代发展的高度，高屋建瓴，提出以西方近代新学取代中国传统旧学，以有益有用的实学代替虚假的玄学，以科学、民主取代愚昧、专制，以思想革命引导和促进政治革命，以改造国民性来适应振兴民族国家的需要。他的这一教育指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教育的总体走向。

其次，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者、发动者、领导者，彻底批判了以孔孟儒教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封建教育思想体系，确立了以进步世界观为指导的中国现代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理念。陈独秀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者到新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世界观也经历了从近代唯物论、进化论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转变。^[26]在此转变过程中，他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批判剖析其封建加殖民的毒瘤病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世界观武装和引导新青年大众，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他因此开了二十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引领中国国民教育之先河。

第三,陈独秀作为北大文科学长,将蔡元培的现代新式教育科学构想付诸实践,为构建“新学”体系起了关键作用,作了重要贡献。在1917-1923年,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学制和体制进行了持续改革,逐步确立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模式。^[27]而陈独秀和胡适等新派学者一起,竭力推行蔡元培的治学思想,为建立“新学”体系尤其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28]

蔡元培曾回忆说,北大的整顿改革自文科开始,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和思想自由的风气得以流行。陈独秀所主持的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为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他主张教育应当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29]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并提出注重外国语,以获最新学理;废讲义,以尽学理;多采购参考书,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30]总之,他主张自动的、启发的新式教育,而反对被动的、灌输的旧式教育。

在蔡元培支持下,陈独秀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是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建立了现代人文科学体系。二是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扩大自主学习、自由修课的空间。三是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四是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保障教学秩序和形成良好学风。五是倡导自由地结社团,积极研修学问与干预国家大事。这种改革,“自始贯穿思想自由的原则,这就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的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31]可以如是说:蔡元培的现代新式教育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陈独秀的实践探索得到验证和实现,并得到丰富和发展的。

三、以“科学”“民主”为统领的现代教育观

陈独秀、蔡元培都竭力倡导、践行和推动科学民主,以“科学”“民主”来统领现代教育革新改良,但是他们的科学民主观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在思想基础方面的差异。陈独秀思想基础,早期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进化论,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陈独秀早期的民主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图民生,反对封建文化,批判国民奴性,仰慕西方近代民主革命,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32]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通过第三国际接受马克思主义,仰慕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主张效法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浓郁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33]蔡元培思想基础是近代人文主义、德国启蒙哲学尤其是席勒、康德哲学美学。蔡元培留学德国四年(1907-1911),接受了德国近代以来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与艺术教育,启蒙思想家们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34]他对康德哲学、美学和席勒美育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并将其作为自己教育、美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在广泛接触西方哲学思想过程中,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尤其康德影响,他几乎无保留地接受了康德学说中有关“想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思想,并将之

运用到他的教育实践之中。^[35]

第二,对科学民主理解方面的差异。总体而言,陈独秀将科学视为人类进化的成果,是适者生存的强大武器,而民主自由是人类阶级社会政治进步的必然结果,是先进政党的必然选择,是先进阶级、人民大众的权利表征。陈独秀早期作为激进革命者,是以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科学民主的,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却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来理解科学民主的,然而无论如何,他始终崇尚科学民主并为之奋斗终身。蔡元培将科学视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民主是市民社会的必然趋势,是每个公民的自然权利。在他看来,“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是民主的重要特征。蔡元培作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庸的人文主义者,他“调和中西,折中新旧”,促使中西“文化交融”,^[36]正是在这种视野中,他理解、诠释和改造了西方近代科学民主思想。

第三,在教育主张方面的差异。陈独秀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把教育看作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手段,主张通过革新教育来唤醒民众,从而实现对国民性的改造。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使国民树立新的道德观、是非观、价值观,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主张进步理想教育,把发展科学、发扬民主、推动社会进步作为现代教育的至上追求,把培养有社会理想、有觉悟、有能力、能适应未来世界新潮流的新国民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与陈独秀不同,蔡元培主张完美人格教育,把崇尚科学、践行民主、推进人类文明作为现代教育的至上境界,把培养广大青少年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生境界作为现代教育的神圣使命。蔡元培“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他认为健全的人格教育内分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这四育共同演进,无一偏枯,才能培养健全的人格。^[37]他指出,“我们的心理上,可以分三方面看:一面是意志,一面是知识,一面是感情。意志的表现是行为,属于伦理学,知识属于各科学,感情是属于美术的。我们是做人,自然行为是主体,但要行为,断不能撇掉知识与感情。……所以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38]

第四,在政治与教育关系方面的差异。陈独秀主张教育介入社会政治,倡导并实践有阶级、有党派、有政治“主义”的,深入社会实际、改造社会现状、服务革命需要的现代教育。蔡元培则主张保持教育的独立性,反对教育介入社会政治,倡导并实践超越阶级和党派,超越政治“主义”,普世的、理想的现代教育。在这方面,他们两人的立场和观点迥异。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39]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非法要求逮捕北大兼职教师、财政总长罗文干,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次日,蔡元培在《晨报》发表声明解释辞职缘由:“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

为同流合污之苟安。”^[40]1月23日,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控诉当权者“止见他们一天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而那些胥吏式、机械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即“有奶便是娘”,甘心充当别人的工具,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41]蔡元培主张以辞职告退,用不合作的办法,同军阀、官僚政客当权者作斗争,既为伸张公理正义,也为维护教育独立。1月24日,陈独秀发表《评蔡校长宣言》,对蔡元培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这种依赖个人“不合作”、“拆台”来打倒恶浊政治,是一种“消极”的、“轻视民众”的缺点。^[42]1月31日,陈独秀又发表《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希望教育界不要再出现“‘教育独立,不问政治’这种毫无常识的话”,指出“‘不问政治’这句话,是亡国的哀音”。^[43]在他看来,教育要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担当革命事业,打倒恶浊政治,就不能不问政治,也就不能实行所谓教育独立。

第五,在学术背景方面的差异。陈独秀擅长政治学、社会学、文学,通晓经济学。蔡元培擅长哲学、伦理学、美学,精通教育学和心理学。因此,他们的学术理路、学术风格、学术贡献,以及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是不同的。陈独秀是具有教育头脑的政治家,而蔡元培是具有政治智慧的教育家。陈独秀将教育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救国救民的社会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同时将教育所具有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精神阐释得淋漓尽致;而蔡元培则彰显了全面素质教育、健全人格培育、良好个性习性养育的功能,并宏扬了教育应具有的人文理性与人本精神。

四、以培养新国民为旨归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思想

陈独秀、蔡元培早期都受过中国旧式的传统教育,后来又都接受了西方新式的近代教育,从传统文化束缚下挣脱出来,批判旧学,倡导新学。他们都试图通过新式教育改造国民,塑造新人,振兴国家。他们都将整个国民尤其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看得非常重要。然而,在如何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问题上,陈独秀和蔡元培的观点并不相同,其价值取向、所追求境界及方法路径也就不同。

首先,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陈独秀教育思想价值取向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培育以社会为本位和以振兴民族国家为己任的新人。陈独秀认为世界观主要包括自然观、社会观(包括政治观)、历史观,世界观具有阶级性、历史性,是人生观、生活观的统领。他非常重视先进阶级、阶层、大众、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陈独秀主张世界观、人生观教育要着眼于国民大众尤其广大青年,通过批判旧世界、改造旧世界,尤其是革除封建的、腐朽的、过时的旧文化,宣传灌输科学的、民主的、现代的新文化,来实现其目标。他激烈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封建文化,试图以近代民主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旧文化、倡导“革命新文化”,旨在培育以社会为本位、

肩负民族责任、立志改造和振兴国家的千千万万新人。

蔡元培教育思想价值取向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则是培育具有自由个性和完美人格的新人。蔡元培认为,世界观主要是科学观、伦理观、审美观、人类文明观,世界观具有普世性、理想性,它引领着人生观、生活观。他十分注重求真崇善尚美紧密结合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认为对群体的教育与对个体的培育应该有机结合,而结合的基础是对社会细胞、生命个体的至诚关怀。蔡元培主张世界观、人生观教育要着眼于千千万万个体,通过对中国旧式教育根本变革,采取全新的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对每一生命个体进行教育、培养、塑造,来达到其鹄的。他说:“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有良好的教育。”^[44]在他看来,能够造就“良好的个人”的“良好的教育”,在近代欧洲尤其德、法两国学校,就是充满人道主义的知(科学)情(美感)意(道德)教育,它对培育生命个体的“完全人格”起决定作用。在古代中国尤其儒家传统中,就是充满高尚道义良心、良知、仁恕义教育,它对培育生命个体的“完美德性”起到重要作用。蔡元培“极高明而道中庸”,试图将两者沟通融合。^[45]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伦理教育、美感教育的探索与实践,旨在培育具有自由个性和完美人格的新人。

其次,所追求的境界的不同。陈独秀所追求的是以科学为信仰的德智体相融合的人生境界。陈独秀在谈到他的信仰时说:“盖宇宙之法有二:一曰自然法,一曰认为法。自然法者,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也,科学属之;认为法者,部分的,一时的,当然的也,宗教道德法律皆属之。……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46]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向青年提出了六点要求,^[47]其中,首要的和根本的即是要青年人建立以自由、平等、独立的近代人格为核心的新道德。陈独秀把建立自由、平等、独立人格摆在国民道德教育的核心地位。^[48]他把健全智力、研习科学、掌握实利手段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任务。他把强健身体、愉悦精神、追求生活幸福作为国民教育的持恒目的。^[49]在陈独秀看来,进步高尚的道德、健全活跃的智力、强健愉悦的体魄的有机融合、协调统一的境界,当是新青年的追求,当然也是新教育的追求,而其境界的灵魂就是对近代科学的理性信仰。

与陈独秀不同,蔡元培所追求的是以近代人文精神为统领的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生境界。蔡元培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兼容了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从终极性和统一性的角度来思考,即从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角度来思考人生观,进而思考伦理与人性问题。”^[50]蔡元培是理想主义者,也是道德至上主义者,他追求的人生理想和道德本体是合一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51]他的人生之理想即“人类共同之鹄的”,就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人道主义。蔡元培从人的终极关怀(终极性)的角度,试图将西方近代“人道之理想”与

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会通融合起来，^[52]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理想与中国儒家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互补统一起来。同时，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性）的角度，把科学教育、道德教育、审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即将求真、崇善、尚美高度统一起来，将人的知、情、意相互协调起来，以培育全面、和谐、完美的理想人格。在蔡元培看来，教育的功能不仅在于教人科学知识，教人谋生手段，更在于培育正确的科学观、伦理观、审美观，培育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生境界。

再次，在方法路径上的不同。陈独秀所采取的基本上是能动的、社会实践的方法路径。陈独秀在《新教育之精神》中批评旧教育指出：现在的学校都是以空相尚，讲究形式。学校的大权掌在教长及少数教职员手中，对学生的困苦全然不顾。把学生当作机械的、被动的，学生只能在书桌上做自己的功课，对外面社会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出了学校不能在社会上立足，那还能望他改造社会吗？似这种学校，不过造几个书呆子出来罢了，于国家没有一点益处。因此他主张“故今日要学新教育有几个要点。1. 宜注意社会方面；2. 当以学生为主体；3. 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际为主。”^[53]具体地说，其一，以社会为本位，培养学生关注社会、了解社会、适应社会，获得社会生活经验，练就社会生存能力，并使学习掌握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职业知识、修身、艺术等，应用于社会取得实在的效果。其二，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人格，激发学生自主自立，发掘学生的潜能和创造精神，使他们将来能够主动为国家出力，并能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造和世界进步事业。其三，以实际为旨归，彻底扫除中国人“爱讲形式、不顾实际”的陋习，教师培养学生讲求“实事求是”^[54]而不“虚张形式”，使他们将来能够脚踏实地，能够知行合一，成为有益于国家社会之新国民。

与陈独秀不同，蔡元培所采取的主要是文明和谐的、情感审美的方法路径。前面谈到，蔡元培是一个理想主义和道德至上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而是一个坐言起行的人。他断然废除学校学生读经，坚决反对一切损害青少年身心和人格的教育活动。但是，他“沟通古今，调和中西”，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西方近现代的先进思想相沟通，并赋予新意，创造出新的文化内涵。他把中西文化中有益于人类文明和谐的成分选择、整理出来，并融通、整合起来，运用于青少年的人生熏陶与人格教育。特别突出的是，他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强调青少年“修身”：以“体育为本”的“修己”，以“知识为基本”的“修学”，以“循良知为基本”的“修德”，以及“良心”的三德“仁、义、勇”与三作用“智、情、意”修养等等。^[55]蔡元培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与审美情怀的人。他毅然制止学校学生信教，坚决反对一切可能造成青少年精神心理缺损的宗教信仰活动。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为青少年寻求没有宗教信仰的精神寓所与情感寄托，寻求超脱功利羁绊的精神自由与情感升华，寻求智、情、意的协调和谐与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生境界。尤其突出的是，他强调美育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

无聊不过于生存上强迫的职务以外,俗的是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高的是渐渐地成了厌世的精神病。……防这种流弊,就要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请诸君实验一实验。”^[56]他希望青年们能够“一方面在知识技能上有科学的基础;一方面在情感上有美术的熏习,以这种健全的精神,宿在健全的身体,真是健全的青年了。”^[57]在德、智、体、美四育中,他平生思考最深、著述最多、用功最勤、着力最大、最有开拓性的就是美育。^[58]他对文明和谐的、情感审美的教育方法路径的探索,为青少年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积累了经验,为后世提供了诸多启示。

五、着眼于塑造青少年健全人格的现代美育思想

蔡元培和陈独秀有一共识,就是认为文学艺术教育对培育青少年健康身心,尤其对塑造青少年理想人格是非常重要的,是一般的科学教育、道德教育所无法替代的。因此,他们都非常重视艺术教育与美感教育。然而,他们的美育观存在很大差异。

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最有价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其美育思想。^[59]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学说,成为中国近现代美育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全面探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这里仅阐述他的美育思想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总体上讲,蔡元培把教育宗旨定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而养成健全人格是他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他教育实践的关键点与着力点。在他看来,要养成健全人格必须通过四育:体育、智育、德育、美育。以往美育是包含在德育中的,未取得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他认为人们“太把美育忽略了,……为要特惊醒社会起见,所以把美育特别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四育。”^[60]不仅如此,蔡元培还赋予美育以特别的地位与价值。他认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61]他号召“吾人急应提倡美育”,^[62]他本人则“愿出全力以倡导之”,^[63]并且“希望致力于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64]

首先,蔡元培认为美育是世界观教育,并且是其感性的超功利之维。这是蔡元培倡导和实践美育的理论基础。蔡元培认为,世界观包括科学(认知)观、伦理(道德)观、审美(艺术)观,科学教育求真,伦理教育崇善,审美或艺术教育尚美,真善美相统一的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观教育。因此,美育是一种世界观教育,或者说是世界观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美育是美感教育,是感性教育,是诗意化、艺术化的情感教育,是摆脱功利、超越现实的情感教育。蔡元培认为:“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活动,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为较近之观照者,是知识;而以供远照、旁招之用者,是感情。”“意志之表现为行为。……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65]他指出:“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

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那么,“美的对象,何以能陶养感情?因为他有两种特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脱。”^[66]在他看来,美的对象的普遍性可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其超脱性可以超越利害的关系,所以到了紧要关头,就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而这种气概与勇敢,“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冶,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67]美育是美感教育,是感情的熏陶,是摆脱狭隘功利的感情升华,它推动智育的求真去伪,推动德育的崇善除恶,因此成为真、美、善相统一的桥梁,成为智、情、意相和谐的纽带,成为人格臻于完善完美的引擎与原动力。

蔡元培的这一思想是受鲍姆嘉通^[68]、席勒^[69]、康德^[70]影响而形成的。后来朱光潜受康德、克罗齐、蔡元培影响,提出了“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的著名观点。他认为人对世界的态度无非三种,即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实用的态度求善,科学的态度求真,美感的态度求美,而美感的态度是非功利性的。“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真善美三者具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71]审美是超越实用功利的束缚与羁绊,超越科学认知的局限与狭隘,是心灵的自由解放,情感的陶冶、净化和升华。因此,美育是纯智育、纯德育所不能替代的,相反,智育、德育只有凭藉美育才能有助于青年世界观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其次,蔡元培认为美育必须着眼于人格培养,艺术教育为美育的重点,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应协同并举。^[72]蔡元培构建了美育的完整体系。一是在美育目标与目的上:他认为,审美具有非功利性,审美教育也非追求功利,而是着眼于完美人格的培养。完美人格的培养,应该是理想的,而非势利的;应该是超越的,而非既定的;应该是面向未来生成的,而非囿于当下不变的。审美教育正是理想的、超越的、面向未来不断创生的,这些也正是完美人格形成的必由路径。二是在美育的内容与重点上:他认为,宇宙自然、大千世界、历史现实的种种美好事物都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成为美育的内容,而美术、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等等,尤其是古今中外优秀艺术作品是审美的主要对象与内容,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点。三是在美育的方法与路径上:他主张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携手协同,创造美育广阔天地。学校从幼稚园到大学校的全程美育,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的全方位美育,从美术、音乐、戏剧、文学等纯粹美育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历史学等特别美育,从自然山水、名胜古迹、博物陈列到社会环境、日常生活、集会活动等普遍美育,共同构成了现代美育的完整体系。

在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中,最富有价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的文艺思想,尤其是“文学革命”、“美术革命”、“戏曲改革”思想。陈独秀并不像蔡元培那样提出了完整的美育思想体系,他的美育思想是和他的文艺革命思想相关联的。

陈独秀并不直接认为美育就是世界观教育,但认为美育对世界观的形成作

用很大,对人的道德、精神、情感、心理影响很大。他援引蔡元培的话“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他援引张申甫的信“宗教本是发宣人类的不可说的最高的情感(罗素谓之‘精神’ Spirit)的,将来非有一种新宗教不可。但美术也是发宣人类的最高的情感的(罗素说:‘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宗教是偏于本能的,美术是偏于知识的,所以美术可以代宗教,而合于近代的心理。现在中国没有美术真不得了,这才是最致命的伤。社会没有美术,所以社会是干枯的,种种东西没有美术的趣味,所以种种东西是干枯的,又何从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国这个地方若缺知识,还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术,那便非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己创造不可。”^[73]他认为:“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可以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使其浓厚、挚真、高尚。在他看来,美术偏于知识,宗教偏于本能,因此美术可以代替宗教。

陈独秀把美育理解为文学艺术教育,将其视为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的最重要媒介或载体。在他看来,从古代至近代,中国有“诗教”“乐教”传统,但它与儒家所主导的封建“礼教”浑然一体,它们共同将广大国民熏染得愚昧麻木和极端守旧。因此,必须进行深刻的思想革命,将广大国民从愚昧麻木状态中唤醒起来,从封建专制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彻底改造国民性”,以塑造崇尚科学、追求民主、人格独立的新国民、新青年。在他看来,为了唤起国民,改造国民,必须进行“文学革命”、“美术革命”、“戏曲改革”。文学革命就是要“革孔孟的命”,因为他们的纲常伦理渗透在传统文化典籍、文章诗词歌赋之中,成为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桎梏。^[74]“文学革命军”大旗上大书特书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奉承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75]美术革命就是要“革王画的命”,因为他们所谓正统实则守旧的艺术思想主宰着画坛,成为人们张扬个性、自由创造的精神枷锁。^[76]要改良中国画,断然不能不采取西洋画写实的精神。“譬如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钞古人的文章。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改革戏曲就是要改变中国传统文化鄙薄戏曲、鄙薄戏子的观念,提高戏曲的名声地位,重视戏曲“开通民智”的作用。^[77]第一,要多多地新排有益风化的戏;第二,可采用西法;第三,不唱神仙鬼怪的戏;第四,不可唱淫戏;第五,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总之,通过“文学革命”、“美术革命”和“戏曲改革”,彻底改造中国国民性,培育和塑造新国民与新青年。

六、蔡元培、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影响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促成了思想文化革命,带动了教育革命。在蔡元培、陈独秀的倡导下,国人逐渐树立了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理念,树立了教育进步是科学进步、民主进步乃至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的理念。这一理念影

响了中国百年教育发展方向和历程。

蔡元培、陈独秀都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者、开拓者,他们竭力引进西方近代先进教育,改革中国传统落后教育,努力使中国教育跟随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大势。他们对现代新式教育的科学构想与实践探索,以“科学”“民主”为统领的现代教育观,以培养新国民为旨归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思想,着眼于塑造青少年理想人格的现代美育思想,为现代中国提供了最为系统、最具前瞻性的国民教育范式,为国民教育开拓了前进道路与广阔前景,也为后世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广阔空间。

蔡元培、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和作用迥然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思想本身差异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特殊社会历史环境所选择的结果。

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倡导超政治的普世教育,而后者主张合理想的政治教育。

蔡元培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之一,但他首先是一个教育家。他坚持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持之以恒地将其贯穿于他的教育实践过程。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他在执掌北大期间,先后聘请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政治态度、学术倾向不同的学人,让他们或执掌学科、或挥执教鞭、或潜心学问,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蔚成风气。他反对政府对学术和思想自由的横加干涉,强调“兼容并包”原则对学术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曾致函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他包容学术思想自由,并消除干涉之失言所带来的不良影响。^[78]陈独秀曾出席北大旅沪同学会致欢迎辞,称赞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倡导并实现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而“独树大学改革之精神”。^[79]

陈独秀首先是政治家、革命家,是从“康梁党”到“乱党”再到“革命党”,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家。他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开始信奉民主主义,后来信奉共产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是具有教育头脑的政治家、革命家,在他那里教育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应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京大学做文科学长,在新式教育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诸多方面有开拓之功。但他始终将教育、学术与政治、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蔡元培、胡适都和他不同。

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的最大影响就是:前者引领北大改革与中国大学现代化转型,划时代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80]后者批判性地解构了中国传统封建教育,重构了中国现代国民教育的文化品格。^[81]

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的地位和影响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教育思想富有时代气息、鲜明独特而极具吸引力与感召力。北京大学教授张翼星先生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特色作了精辟的概括: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第一个鲜明特色,是突显

一个“人”字,他心目中有一个“大写的人”,或曰“理想的人”。他要培育一种完全的人格。第二个鲜明特色,是突显一个“大”字。他是我国现代“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的奠基者。第三个鲜明特色,是突显一个“美”字,他特别强调美育,用来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审美能力和精神境界。^[82]蔡元培主张兼容并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培育超越现实政治的大学精神;主张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举,突出美育,培养学生真善美统一的完全人格。这无疑具有科学民主精神、人文情怀和理想色彩,因此,它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具有永恒的价值与启示;也因此,它难以为教育界普遍真正理解和自觉践行。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叶,外敌入侵,内战频繁,民不聊生,他的这一杰出教育思想只能在知识精英阶层引起共鸣,在执政者和国民中都和者概寡。即使在20世纪后半叶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他的思想在不断地被回忆、被诠释、被推崇中,而渐渐地被忘却和退色,成了知识精英阶层的“怀旧”甚至“凭吊”。^[83]

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陈独秀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一,突显“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他高扬科学民主旗帜,批判中国封建传统教育,以西方新式教育取代中国旧式教育,旨在启蒙新青年,塑造新国民,拯救灾难深重、濒临亡种的中华民族。其二,突显“文化革命为空前创造”。他进行文学革命、美术革命、戏曲改革等等,旨在打破传统桎梏和精神枷锁,张扬人的个性,发挥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为新文化新教育开辟前进道路。其三,突显“教育的实践性与实利性”。他竭力强调教育的实践性、实用性、实利性,旨在推动教育走出象牙之塔,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强国健民,利国惠民,振兴民族国家。同时,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务实精神与现实意义。因此,它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具有实用和可操作的价值;也因此,它在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实行过程中容易被工具化、被扭曲。在20世纪前半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中国教育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革命的工具。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教育又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当然,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曲折厄运主要是历史造成的而非个人所为。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陈独秀的文化革命思想在继续发挥巨大影响,但他的教育思想却逐渐被边缘化而最终销声匿迹。50年代至70年代,在中国大陆,陈独秀的政治革命思想、文化革命思想及其教育思想成为被批判的“右倾”标本。但是,陈独秀的文化革命思想和教育思想深深地存储在中国现代历史记忆中,并且不时地被唤起、被激活。李泽厚曾说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界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84]在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陈独秀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代表和“五四”运动领袖重新受到思想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也成为研究和争鸣的重点热点。

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它们应该也可以相融互补。蔡元培教育思想富有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品格,而陈独秀教育思想更具有务实精神和现实主义品格,这些都是中国现当代教育改革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品格。

长期以来,中国国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人文价值导向与功利价值取向之间徘徊,在理想主义宗旨和现实主义目标之间摇摆,自觉不自觉地两者之间寻找立足点和平衡点。我们对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进行深入诠释和深度综合,并加以吸收和借鉴,有助于我们摆脱上述徘徊摇摆,有益于我国国民教育的当前改革和未来发展。

(本文初稿于2009年7月,修改于2011年10月,定稿于2013年10月。曾在2009年全国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上作专题报告。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校友会、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的支持与帮助。)

注释:

- [1] 陈独秀:《随感录》,《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
- [2] 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208页。
- [3] 陈独秀:《平民教育》,《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429页。
- [4] 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357页。
- [5] 蔡元培:《我之欧战观》,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页;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9页。
- [6] 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06年,第432页。
- [7]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9页。
- [8] 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37页。
- [9] 蔡元培:《国外勤工俭学与国内工学互助团》,《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页;《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65页;《劳工神圣》,《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64页;《华工学校讲义》,《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85页。
- [10]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8页。
- [11] 蔡元培:《北京大学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82页。
- [12] 蔡元培:《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700-701页。
- [13] 蔡元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真善美》(附:同题异文),载《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 [14] 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02页。
- [15]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0页。
- [16]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 [17] 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1-576页。
- [18] 参见钱理群:《校园风景中的永恒》,载《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 [19] 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633页。
- [20] 蔡元培:《关于不合作宣言》,胡适:《蔡元培先生的“不合作主义”》,载《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 [21] 从常识讲,应该是“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然而,治校为了治学,治学为了育人,治学育人是根本,因此治校服从于治学,就此而言,“教授治校”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重要特征。但是,也不可“教授治校”泛化,将高校所特有的学术性权利混同于一般行政性权利。科学划分学术性权利与行政性权利,处理好两者关系至关重要。因此,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探索给后人诸多有益启示。
- [22][23][24][27]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6-87、93、95-97、114-124页。

[25]张曙明:《陈独秀教育思想的特征》,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2009年年会学术报告集。

[26]陈独秀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者到新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世界观也经历了从近代唯物论、进化论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转变。参见朱文华:《陈独秀传》第五章,红旗出版社,2009年。

[28]参见朱文华:《陈独秀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65页注释[1]。

[29]陈独秀:《答胡子承》,《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347页。

[30]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437页。

[31]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32]沈寂:《论陈独秀早期的民主思想》,载《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

[33]沈寂:《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载《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

[34][35]张晚唯:《蔡元培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1-48、157-158页。

[36]戴维翰(William J. Duiker):《蔡元培与中西文化融和》,载张晚唯:《蔡元培传》附录,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

[37]蔡元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59页。

[38]蔡元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25页。

[39]蔡元培:《大学独立议》,《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585页。

[40]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次日,蔡元培在《晨报》发表辞呈:“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蔡元培:《向大总统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呈》,《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9页。

[41]1月23日,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阁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蔡元培:《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36-38页。

[42]1月24日,陈独秀发表《评蔡校长宣言》:“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蔡校长打倒恶浊政治的运动,也只看见学者官吏而看不见民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第12-13页。

[43]陈独秀:《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第14页。

[44]蔡元培:《何谓文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91页。

[45]蔡元培引进西方近代人道主义思想来改造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又创造性地对两者进行互相诠释。他把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博爱”视为“道德之要旨”和“公民道德之原则”,并以中国古代的“义”来解释自由,以“恕”解释平等,以“仁”解释博爱。他用西方近代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良心,认为良心有“体”、“用”之分。良心的“体”即所谓先天的道德本能,“用”则指知、情、意心理因素的统一体。参见陈剑旒:《蔡元培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86页。

[46]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278页。

[47]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158-163页。

[48]徐国利:《关于陈独秀“伦理革命”思想的再认识》,《陈独秀研究》第三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页。

[49]陈独秀:《新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209-210页。

[50]陈剑旒:《蔡元培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51]聂振斌:《导读:蔡元培及其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蔡元培》,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52]蔡元培的北大学生、后来成为僚属的傅斯年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之圣贤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观。”陈平原、郑勇编:《蔡元培追忆》,三联书店,2009年,第165页。

[53]陈独秀:《新教育之精神》,《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190页。

[54]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陈独秀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并将其作为“新教育之精神”之一,其主要内涵是新教育要讲求实际,注重效果,而不虚张形式,徒有外表。参见《新教育之精神》,《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192页。

[55]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78-81,90-93,93-96,153-155,164-166页。

[56]蔡元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27-328页。

[57]蔡元培:《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15页。

[58]郭建荣:《极高明而道中庸——蔡元培美育思想探析》,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32页。

[59]张勤:《蔡元培“完全人格”与和谐教育》,《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5-110页。

[60]蔡元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61页。

[61]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133页。

[62]蔡元培:《对于学生的希望》,《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36页。

[63]蔡元培:《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68页。

[64]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740页。

[65][66][67]蔡元培:《美育与人生》,《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90,290,291页。

[68]鲍姆嘉通(Baumgarten, 1714-1762)主张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而且把它命名为“埃斯特惕克”。他的哲学是对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理性哲学的进一步系统化。他看到人类心理活动既然分成知情意,相应的哲学系统中就有一个漏洞,因为研究知或理性认识的有逻辑学,研究意志的有伦理学,研究情感的还没有一门相应的科学。他建议应设立一门这样的新科学,叫做“埃斯特惕克”,这字照希腊字根的原义看,是“感性学”的意思。从此可见,这门新科学是作为一种认识论提出来的,而且是于逻辑学相对立的。莱布尼兹的“明晰的认识”所区分的“明确的认识”(理性认识)与“混乱的认识”(感性认识)于是在科学系统中都有了着落,前者归逻辑学而后者归美学。他1735年在《关于诗的哲学冥想录》中首次提出建立美学的建议,到了1750年他就正式用“埃斯特惕克”来称呼他的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十章第二节(二),《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69]席勒认为,分裂人的有两种冲动,这就是感性冲动即物质冲动和理性冲动即形式冲动。这两种冲动的特点: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它要占有、要享受,被官能所控制,是被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自然人。理性冲动的对象是形象,它要的是秩序和法则,受思想和意志的支配,是主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理性的人。但这两种冲动各自都有强迫性,不能直接结合。若使这两种冲动能以结合,人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中间必须架起一座桥梁,这桥梁便是审美教育,让艺术充当使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和人性的教师。艺术起源于另一种冲动,即游戏冲动。“游戏”一词可以说是自由的同义语,游戏冲动既能驾驭生活(感性冲动的对象),从生活中取得素材,也能创造形象(理性冲动的对象),用形象体现精神,因而它的对象是“活的形象”。这“活的形象”也就是艺术的本质。“活的形象”把感性与理性、被动与主动、物质与形式、变化与规律等等对立面都结合起来,成为从感性状态到理性状态、从物质到形式的桥梁。审美教育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格。参见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中译本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70]康德按照古希腊传统把人的心理功能分为“知”、“情”、“意”三部分,认为人与此相应也具有三

种认识能力,即理解力、判断力和理性。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沉思,他建构起了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是一个相互联系又互相支撑的有机整体。在他那里,“情”是沟通“知”与“意”的中介,而“判断力”(审美的)是沟通“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参见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1-71页。康德三大批判是对人的知、意、情三种心理功能的分别研究,所要解决的是真、善、美的问题。参见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第九章第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71]朱光潜在《谈美》中提出“我们对于一个古松的三种态度”的著名观点。面对一个古松,木商、植物学家、画家分别持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三种不同观照态度,他们眼里的古松形象和心中的古松价值也就全然不同。“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事物都浑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实用求善,科学求真,美感求美。朱先生指出:就“用”字的狭义来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不太切实用的人物。科学家的目的虽只是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然而,求美是人所以异于动物的特性之一。“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真善美三者具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页。

[72]蔡元培:《美育》,《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599-604页。

[7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220页。

[74][7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290、289页。

[76]陈独秀力倡美术革命,归根结底在两端,其一以写实主义改造主观写意画法,其二以创造精神改变摹仿复古之风。其本质是以西画画风改造中国画画风,以现实主义改造中国国民性。对此,至今美术界、学术界仍有争论。参见陈独秀:《答吕澂》,《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15页。

[77]陈独秀:《论戏曲》,《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82页。

[78]蔡元培说:“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正赖大德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实之言。”蔡元培:《复傅增湘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5页。

[79]陈独秀:《在欢迎(送)蔡子民出国宴会上致词》,《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302页。

[80]冯用军、郭锐华:《蔡元培改革北大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4-94页。

[81]陈独秀不仅把近代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引进中国,而且把当时西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与时俱进的品格。参见沈寂:《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5页。

[82]张翼星:《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鲜明特色》,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51页。

[83]参见陈祥明:《北大“哲学门”怀旧》,《读书》2013年第2期。

[84]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责任编辑:书缘]